序言

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具體來說就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中國內地到香港的一些作家的創作及文學活動。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角度看，這是另一種“租界文學”、“孤島文學”（不僅借用空間，還和租界、島上的文學文化發生聯繫）。從香港文學研究的角度看，則是較早期的“南來作家”的文學。“香港書寫”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轉折意義，至今沒有得到學界充分重視；但“南來作家”在香港文學史裏的作用、影響，卻已經很受關注甚至已被過分強調。

在香港新文學的百年歷史上，至少有四五批“南來作家”。並不是出生在內地的香港文人均是“南來作家”，三蘇、西西、金庸等香港作家也在廣東或江浙出生，從不會被稱為“南來作家”。“南來作家”這個概念，意思是“南來”時已是“作家”。（像劉以鬯那樣雖然在上海也從事新文學活動，但並未怎麼出名，主要成就在香港建立，故也不算“南來作家”。）

五十年代以後的“南來作家”，如徐訏、張愛玲、曹聚仁等，雖然也可以在廣義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進程中討論，但他們的“香港書寫”的文學史意義，與侯桂新所討論的三四十年代的“南來作家”截然不同。如果說張愛玲、徐訏等是準備“逃離中國”的悲情文學，茅盾、夏衍等則是準備“解放中國”的革命文學。

無論在劉登翰、袁良駿等內地學者撰寫的《香港文學史》、《香港小說史》，還是在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等香港、海外學者編著的香港新文學史料中，三四十年代南來作家的影響都得到很大篇幅的關注和強調——但關注的角度是不同的。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認為，“內地作家的南來，對於香港新文學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以傳播新思

想、新文化、新文學、宣傳抗日等實績性行為，為香港正在興起的新文學注入了新鮮的思想和藝術養料……南來作家以自己積極參與現實鬥爭的憂國憂民的作品，培植並影響了香港本土的青年作家，從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面，提高了香港新文學的水準。”[1] 但黃繼持等學者卻認為，“（內地文人）來港後香港作家的主體性反而降低了，甚至幾乎被淹沒了，或者是被‘邊緣化’了。……香港的主體性被中國主體性取代了。……”[2]

侯桂新的研究沒有就這些“南來作家”與本土文學的複雜關係作出太多與前人有爭議的分析判斷，但他在重新整理這種關係和影響的時候，引入了另一個文學史的視野：即“南來作家”怎樣受到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指揮而在香港從事文學活動，怎樣有意識地展開一些在中國其他地區（解放區除外）無法展開的文學運動和文化批判，怎樣運用這些文學批評（包括“方言文學運動”）來影響文學的政治傾向和社會效用。簡而言之，1949 年以後“中國當代文學”的種種意識形態策略和技巧，發軔於延安，實驗於香港，後來才推廣於全國——這種文學生產體制，幾經演變，至今仍然存在。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實際上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向當代文學的一個演習式的轉折，其文學史意義值得重新評析。

正是在這個學術背景上，我很樂意看到侯桂新“越界”（從北大到嶺南）的研究成果並為之寫序。文學史研究，也與族群意識、性別研究或民族主義一樣，糾結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許子東

1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 年），頁 77。

2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頁 24。

緒論

……現在到香港來的“外江佬”和本地的同胞，大家用不着再記憶着那地域給我們劃出來的種種區別，而應當為中國的將來想，在這裏共同努力樹立起來中國的新文化中心。

——薩空了（1938，香港）[1]

正因為我們知識份子在新中國將擔負巨大的工作，所以我們無論在思想意識方面或工作能力方面，都要感到無論如何還不夠得很。

——茅盾（1948，香港）[2]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本書論述的對象是“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主要關注的是現代旅港作家——即學界所稱“香港南來作家”——在香港旅居時期進行的文學書寫，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在這一時間段，中國現代作家在其香港書寫中展現了怎樣的現代民族國家想像？與此緊密相關的問題則是：中國現代文學在香港發生了什麼？它為香港文學帶來了什麼？

中國現代文學與香港的大規模遭遇，始於現代史上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及接踵而來的國共內戰兩次大型戰爭的爆發。受戰亂影響，一批又一批內地作家為了避難或從事海外宣傳，紛紛南下香港以及新加坡、馬來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地，形成日後學界所稱的“南來作家”現象。事實上，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版圖上，作家南下香港或南洋等地是一個持續不斷而引人注目的現象。僅以香港為例，其中形成較大規模的共分五批，分別集中於抗日戰爭時期（代表作家有茅盾、戴望舒、蕭紅、許地山、葉靈鳳、端木蕻良、夏衍、蕭乾、徐遲等）、國共內戰時期（代表作家有茅盾、郭沫若、夏衍、馮乃超、邵荃麟、周而復、袁水拍、司馬文森、聶紺弩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代表作家有劉以鬯、曹聚仁、徐訏、徐速、李輝英、司馬長風、金庸、梁羽生、倪匡等）、“文革”中及以後（代表作家有陶然、東瑞、顏純鈎、梅子、張詩劍、楊明顯等），以及改革開放時期即八九十年代以後（代表作家有王璞、程乃珊、蔡益懷、黃燦然、廖偉棠等）。從時間段上看，前兩個時期的南來作家規模和對當時文壇的影響最大，而從南來作家的分佈看，以香港最為集中，是以本書即選取前兩批香港南來作家為研究對象。[1]

自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戰爆發至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南下香港的內地知名作家超過二百人，郭沫若、茅盾、胡風、蕭紅、戴望舒、葉靈鳳、夏衍、蕭乾等都與香港有過或深或淺的關聯，茅盾、戴望舒等更是多次南來，在當時的香港文壇極為活躍。據筆者初步統計，這二百多名作家中，雖然大半只屬過境性質，在香港只有短暫逗留，但也有相當比例的作家由於各種原因滯留於此，居港時間較長：胡風、施蟄存等十餘人長於半年，郭沫若、蕭紅、蕭乾、穆時英、馮乃超等十餘人在一年至兩年之間，茅盾、夏衍、端木蕻良、邵荃麟、周而復、樓適夷、歐陽予倩、徐遲、葉君健、秦牧等二十餘人在兩年至三年左右，黃谷柳、林默涵、黃藥眠、陳殘雲、司馬文森、袁水拍等二十餘人在港居住三至五年，戴望舒、許地山、葉靈鳳、林煥平等則長達五年以上，有的在此長期定居乃至終老。倘若拋開“作家”的狹義定義，將南下的新聞、戲劇、電影、音樂、美術、教育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人士一併納入，更是組成了一支浩浩盪盪的文化大軍，人數上千。[2]

這支文化大軍，以其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將當時的香港（淪陷時

1　了了〔薩空了〕：〈建立新文化中心〉，《立報・小茶館》，1938 年 4 月 2 日。

2　茅盾：〈歲末雜感〉，《文藝生活》總第 44 期（1948 年 12 月 25 日），頁 3。

1　除了規模和影響相似，將這兩批南來作家合在一起研究，還由於以下原因：其一，這兩批作家南來原因相似，背景相似，主要是受戰爭影響，在人員上也有較大程度的重合，在文學活動和文化建設方面有較強的延續性；其二，這兩批作家的南來發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三個十年”和香港新文學史的發軔期，在文學史格局中的地位相似。

2　據《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 年）統計，1949 年 7 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與會代表 648 人，其中從香港或經香港北上的代表即超過 110 人。

期除外。主要集中於 1938—1941、1947—1949 年間）塑造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全國性的“臨時文化中心”。[1] 這一文化中心雖則是“臨時”的，卻不僅在當時轟轟烈烈，同時也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亦包括香港）文學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留下了鮮明的印記。尤其是在文學史領域，一方面，南來作家群體在港創作發表了大量不同文體及風格的文學作品，不少成為流傳後世的傑作，如茅盾的《腐蝕》、蕭紅的《呼蘭河傳》、許地山的《玉官》、黃谷柳的《蝦球傳》、戴望舒的《災難的歲月》等，都早被公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或香港新文學史上的經典，對後來的作家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南來作家在港期間開展的內容豐富的諸多文學論爭，包括抗戰期間的“民族形式”論爭、“反新式風花雪月”論戰，以及國共內戰期間的文藝大眾化與“方言文學”論爭、對“反動文藝”的批判等，或者是全國性論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是香港文壇獨有的理論批評活動，對中國現代文藝思想的發展進行了較深入的探索。其中發生於 1948 年《大眾文藝叢刊》等刊物上的對“反動文藝”的批判，更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頻繁發生的文藝批判運動的預演，對新文學的整體走向產生了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同時，南來作家積極引進毛澤東著作，在對毛澤東文藝思想進行權威闡釋和經典化方面作出了前瞻性的貢獻。

南來作家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理應得到學界關注。對這一群體的深入研究，有益於“中國現代文學”與“香港文學”[2] 的完整建構，有助於豐富我們對文學史的理解。倘非如此，不管是中國現代文學缺少了它

1 這既是南來文化人努力的目標，也是達成的現實結果。有學者認為，1938—1942 年間，武漢陷落後，“重慶、桂林、延安、香港等城市，就都經常發揮着文化中心的作用。”見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年），頁 361。另一位文學史家則如此表述 1946 年後香港的文化地位：“內戰開始以後，由中共中央安排，在國統區的左翼文化人士和‘進步作家’，先後來到香港，香港成為 40 年代後期的左翼文化中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2 版），頁 10。

2 依目前慣例，本書中出現的“中國現代文學”、“香港文學”，以及“中國當代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概念，如無特別說明，均指各自範疇中的“新文學”，即以現代白話為載體寫就的文學。與之類似，文中出現的“文壇”一詞，一般也專指由新文學作者組成的文學界。

的香港環節，還是香港文學無視它的南來影響，我們對於文學史的想像都將殘缺不全。

第二節　現有研究述評

一、香港學者

對南來作家進行較有系統的研究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的香港。其中，在史料建設方面，香港中文大學學者盧瑋鑾耕耘數十載，成績最著。1981 年，盧瑋鑾以論文〈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1941）〉獲香港大學碩士學位，並於此後延續了對這一課題的關注，編纂出版了大量作品選、史料集及研究專著。最早的一本名為《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1]，集中收錄了數十篇內地作家描寫香港的散文，而以樓適夷的一篇〈香港的憂鬱〉作為書名，大致可以看出中國現代作家對於殖民統治時期香港的基本觀感和態度。緊接的是《茅盾香港文輯（1938—1941）》[2]，收錄了此期茅盾在香港報刊上發表的全部隨筆評論作品，有助於從中理解茅盾三四十年代之交的思想與創作風貌。這也是時至今日，為單個南來作家的香港書寫編訂的唯一一部作品集。1987 年，盧瑋鑾出版了她的重要著作《香港文縱》[3]，副題為“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該書仔細梳理了香港新文學早期發展流變的歷史軌跡，對茅盾、戴望舒、蕭紅、豐子愷等人在香港的行蹤和文學活動進行了鉤沉，尤其是對當時香港兩個最重要的文學文化團體——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與中國文化協進會的活動史實作了詳細考辨，從中可以窺見其時香港文壇的基本面貌。此書可謂對南來作家進行專題研究的拓荒性的著作。此後，她與鄭樹森、黃繼持合作，於 1998—1999 年連續推出了四本有關二十至四十年代香港新文學的“作品

1 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1983 年）。

2 盧瑋鑾、黃繼持編：《茅盾香港文輯（1938—1941）》（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 年）。

3 盧瑋鑾：《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7 年）。